← (上接5版)

特殊的学术因缘。除去吴先生谈及的这段往事，夏氏兄弟的著作中译本很多也都是在香港面世，并且经由香港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夏志清的好友宋淇长期旅居香港。而您也一直在香港工作、生活，能否请您谈一谈夏氏兄弟其人其书在香港的传播情况，以及在您看来，在香港阅读他们的著作，是否具有某种独特的体验与感受？

陈国球：香港学界对于夏志清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台湾学界。刚才已经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最早是在香港出版的。此后，夏志清也有很多著作在香港流传。他的著作在香港影响很大。例如，张爱玲虽然曾经在香港驻足，但香港学界真正开始关注她，还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再如，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撰写《中国新文学史》，颇有参酌《明报月刊》上夏志清的《小说史》中译。至于后来夏志清苛评司马长风之作，两人因而笔战，则是后话了。夏志清又有《印象的组合》一书，由香港文坛重镇刘以鬯负责编辑。近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更全面整理夏氏昆仲的著作，不少英文著述有了新译，相信对学界又有新的影响。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中介。你谈到吴福辉先生的回忆，应当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不仅北大学人通过香港开始接触夏志清的著作，上海的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位先生也曾经告诉我，他们最早阅读的夏志清的著作也是从香港传入的。

当然，谈论夏氏兄弟与香港的学术因缘，如果仅从著作传播的层面上立论，恐怕不免太过简单。夏志清和他哥哥夏济安与宋淇的关系是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兄弟二人在上海读书时，就认识宋淇了。而他们之间的交谊，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因此，我读《书信集》时很关心他们是怎么讲宋淇的。宋淇与他们的关系绝不是“好友”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的。

他们三人之间有许多批评，但也有很多鼓励，更有对于各自的人生道路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夏济安在香港时期的生活问题，就有很多是宋淇利用他在美新社的身份帮忙解决的。他到台湾以后，宋淇也继续支持他的文学事业，为他的《文学杂志》组稿。与此同时，夏氏兄弟对于宋淇的工作也经常施以援手。我注意到，宋淇在1961年出版过一本《美国文学批评选》。尽管这一选本的编者署名“林以亮”（宋淇笔名），但我相信夏志清为此也下了很大

功夫，因为通过选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介绍的文学批评的观念许多都是当时耶鲁大学流行的，而这无疑是夏志清为宋淇提供的资讯。他们“合作”的这一选本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夏氏兄弟与宋淇的交谊很有意义，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志清在耶鲁所受的学术训练。

李浴洋：提及宋淇，便不能不说到今年同样也有一部与他相关的“书信集”问世，那便是吴兴华的《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我知道，吴兴华是您很感兴趣的学术对象。他与宋淇的通信是在1940至1952年间进行的。这与夏氏兄弟的通信时段（1947—1965）恰有部分重合，而相近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也让这两部“通信集”中的话题多有关联。将两者对读，或许不失为一种策略。您对于两者都做过专门研究，不知是否有什么发现？

陈国球：你的思路很好。我在看他们四人的文章时，也想到应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思考。通过他们的书信与回忆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在上海时期，宋淇与夏济安曾经是校友，他们合办过文学杂志。宋淇常去夏济安家中，有时夏济安不在，他就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夏志清交谈，夏志清很多关于英国诗歌的知识，都是通过宋淇了解到的。而宋淇与吴兴华是燕京大学的同学，经由这层关系，夏氏兄弟也很早便知道了吴兴华。无论是宋淇与吴兴华，还是宋淇与夏氏兄弟，他们之间都是相互欣赏的。夏、宋、吴等又与其他背景及兴趣相似的学人，构成了一个松散的知识社群。当时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学》杂志，便是以他们为主力。夏济安与吴兴华经常给这家杂志投稿，宋淇更是串连京沪两地作者的联络人。顺带一提，杂志的编辑之一是柳存仁，这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曾几度在香港居停，对香港的文化和教育都有过重要的影响。

《西洋文学》非常精彩。后来夏济安到台湾以后重办《文学杂志》，其渊源一是朱光潜办过的《文学杂志》，另外一个便是《西洋文学》。1952年之后，吴兴华与宋淇书信断绝，但他的作品却开始以“梁文星”为笔名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吴兴华本人对此应当并不知情，这是出自十分欣赏他的宋淇与夏济安的好意，他们有意把吴兴华的文学火种播撒到香港与台湾地区。而“梁文星”在当年的确也成为了港台文坛上风靡一时的人物。

与桑德尔教授一席谈

黄进兴

六月初，偕同吴咏慧去参加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晚宴，碰巧主办单位安置我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比邻而坐，喜出望外，竟有了一场智识的飨宴。据说经由大会的力邀，他才万里迢迢前来担任主题演讲，当然是全场的聚光点。

桑德尔（1953—）系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正是当今红透半边天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课——“正义”（Justice）：一场思辨之旅，充分展现苏格拉底辩证证的教学法，修课者动辄上千，座无虚席，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自是哈佛的文化一景。尤其经由网络教学的加持，从学院走入群众，虽不至于家喻户晓，但是绝对称得上明星级的人物。这由观众前仆后继涌上索取签名，便可得证。

大会为增添热闹的气氛，特别安排了一团洋乐队伴奏。作为背景音乐，曲目虽佳，但对我与桑德尔教授难得的交谈，却显多余；因为颇受干扰，不时要提高嗓音，接头接耳。

据统计，哈佛的学生不出三分钟，就会道出自己系出名门，我自然未能免俗。之前与桑德尔教授素不相识，因此揖让而坐后，立向他供出自己1980年代也曾在哈佛进修过；该时恰巧也是初出茅庐的桑德尔，刚到哈佛任教通识课程的时候。虽说我们两人在哈佛有数年的重叠，但其时两个默默无闻的小卒，究竟难有结识的机缘。但三十年后却在异地他乡，在一场盛宴中得以巧逢，也算是冥冥中有缘了。

桑德尔一望即知是位温文尔雅，辩才无碍的学者。最初，我拜读过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1982），该书乃是改写自其博士论文。他以批评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起家，我对他的论点始终半信半疑，可能源于我对罗尔斯无所保留的忠诚与景仰所致。但日后，我发现罗尔斯一再改写其《正义论》，信心未免有所动摇，我遂提问桑德尔教授，是否因为他所主张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观

点，遂促使罗尔斯一再改写其经典成作。桑德尔回答：“可能是这样吧！”我又问他：“是否曾和罗尔斯当面陈述过你的观点？说服了他？”桑德尔言道：“罗尔斯总是很礼貌，莞尔而笑，不作答。”他的回答正切中我一贯对罗尔斯的观察。

之前，我虽主修历史，但六神无主，喜欢到处听课，尤其哲学系名师辈出，更是我的最爱。每回有空就往那里跑，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教授因是委婉的劝诫：“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颇有被高估之嫌。”意谓切勿荒废正业。但我一心只想向西方取经，加上罗尔斯正是我心目中无上的哲学英雄，遂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我跟桑德尔转述，罗尔斯因口吃之故，讲课并不顺畅；授课内容复深奥难懂，每逢开学固然高朋满座，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在少数；课程进行，学生渐有流失之虞，使得罗尔斯顿感窘促，叹谓“我留不住人了（I am losing people）”的趣事。

我们又聊到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三杰”中的其他两位：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的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曾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可是却常成为哲学鬼才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教授在课堂上的笑柄。普特南曾口无忌惮地说：“我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瞧不起他。”显然极为不屑。这当是瑜亮情结所致。两位均是风头正健的同事，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我一时想不起第三位是谁？只记得从牛津大学来哈佛客座的法律哲学家，桑德尔马上脱口而出，“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 1931—2013）！”

桑德尔复追问，到底我在哲学系又上了那些人的课？我说伦理学的弗思（Roderick Firth, 1917—1987）教授。是氏循循善诱，讲课条理分明，个人受益良多。按课表，最后一堂课必须讨论罗尔斯，他竟说伟大的哲学家就在隔壁教室，他不复多言，请各位来日移步去倾听本尊。弗思教授谦逊盖如是。桑德尔谓，弗思教授年纪较大，早已从哈佛

退休。

因为这些前贤一一作古，令人不胜唏嘘，彼此突然静默了一段。

之后，我又道及从德国前来客座的亨里希（Dieter Henrich, 1927—）先生，系主任介绍他乃是康德与黑格尔的最权威。的确，他的“黑格尔”，自家人娓娓道来，既亲切又厚实；只是我欲语还休，不好说出比起桑德尔的业师——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的《黑格尔》一书，尚精彩许多。

于是，桑德尔好奇地问我，本业为何？我遂有了播送一己之学的契机。个人原以思想史为志业，近年则探究儒教的宗教性质。可能受到罗尔斯的潜移默化，舍弃定义式的概念纠结（以罗尔斯的个案，则是舍弃分析哲学的概念解析），改取“神圣空间”（Holy ground）的进路，聚焦孔庙圣地的分析，避开传统经义的缠绕不休，遂略有所获。

我复顺道提醒他，令师泰勒的巨作《俗世的世纪》（*A Secular Age*, 2007）虽荣获国际大奖（Templeton Prize），但其俗世化的论述却难以涵盖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桑德尔遂兴冲冲地告诉我，年底哈佛将刊行他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与儒家、道家比较的著作，盼望彼此可以切磋。我当然更望早日拜读，沐浴新知。

因为早知桑德尔的著作有多国语文发行，一时掩不住虚荣心的作祟，也散帚自珍地提示他：拙作当下也有几种语言正在译译。

结束前，他突然既客气又严肃地提问，为了明日的讲演，有何在地的议题，可资取用。我就说，目前此地烫手山芋的议题，便是“年金改革”，代表不同世代利益的冲突，恐怕连罗尔斯的“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都难以介入其中。另一个普遍的问题，便是“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但不知会否派上用场？桑德尔频频点头，称是。话题不断，一来一往，谈兴正浓，背后乐队的伴奏却戛然而止，原来晚宴已告结束，该是曲终人散，拱手道别的时候了。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